

清代中後期來華西方人的海幢寺印象與 宗教文化觀念

張龍平

[摘要] 廣州海幢寺始建於明末，自清初全面擴建後，恰逢中西貿易興起。為防範“外夷”，海幢寺成為外國商人閒遊之地。因參與接待清中後期的商人、使臣而在西方世界聲名鵲起，海幢寺吸引更多西方人慕名而來。通過西方商人、外交官、傳教士、畫家等群體對海幢寺的書寫，塑造了海幢寺在西方世界的複雜多元形象，成為瞭解中國的窗口。但出於自身固有之宗教認同，西方人對於海幢寺的宗教景觀、宗教儀式、宗教信仰、宗教思想存在偏見之處，這種偏見影響到了中西交往，卻為開啟在華傳教營造輿論基礎。

[關鍵詞] 海幢寺 西方人 宗教文化 一口通商

廣州海幢寺始建於明末，經清初擴建後形成殿、閣、樓、塔、堂、舍一應俱全的佛教叢林。海幢寺建成後，廣州進入對外貿易的“一口通商”時代，一批批商人、傳教士、外交官、遊客聚集廣州，在朝廷防範限制“外夷”的整體氛圍下，地處珠江南岸，與廣州城隔江相望的海幢寺便成為接待“外夷”的絕佳之地。對此，蔡鴻生教授在《廣州海幢寺與清代“夷務”》一文中已有清楚的論述。^①隨着遊覽海幢寺的“外夷”日益增多，海幢寺在西方人筆下出現的頻率也越來越高，成為當時西方世界認識廣州佛教文化，瞭解中國宗教信仰的一扇窗戶。本文聚焦清代中後期，在“一口通商”與開啟在華傳教的大背景下，通過梳理不同身份的西方人對廣州海幢寺的書寫，考察來華西方人的海幢寺印象及其宗教文化觀念。

一、海幢寺與“外夷”

明清之際，廣州佛教盛行，逐步形成光孝、華林、大佛、長壽、海幢等五大叢林，其中尤以海幢寺與“外夷”接觸最為頻繁。自乾隆年間“一口通商”政策全面實施後，清廷的對外貿易

作者簡介：張龍平，暨南大學社會科學部副教授、歷史學博士。廣州 510632

* 本文係《廣州大典》與廣州歷史文化研究資助專項“晚清旅粵西人的嶺南文化印象研究”（項目號 2015GZY05）的項目成果。同時也是廣州市“廣州城市精神與城市形象”重點研究基地的研究項目之一。

^① 蔡鴻生：《廣州海幢寺與清代“夷務”》，《廣州海事錄——從市舶時代到洋船時代》，北京：商務印書館，2018年，第237—250頁。

被嚴格限制在廣州，不久朝廷又頒佈《防範外夷規條》，提出“外人到粵，令寓居行商館內，並由行商負責管束稽查”。^①十三行商館區空間狹小、環境嘈雜，這一限制外商活動自由的做法顯得不近人情，外商也多有抱怨，希望朝廷“指一闊野地方行走閒散，以免生病”，因之乾隆末年朝廷“曾准於每月初三、十八兩日，令赴關報明，派人帶赴海幢寺、陳家花園內，聽其遊散，以示體恤”。1816年，兩廣總督蔣攸銛示：“茲查近年已無陳家花園，各夷人每有前赴花地遊散之事。從前原定每月兩次准該夷人出外閒遊，茲酌定於每月初八、十八、二十八日三次，每次十名，人數無多，隨帶通事，易於約束，添以次數，則夷人可以輪替前往，於俯順體恤之中，仍寓稽查防閒之意。准其前赴海幢寺、花地遊散解，夷人每次不准過十人以外，着令通事赴經過行後西炮台各口，報明帶同前往，限於日落時仍赴各口報明回館……”^②此外，“海幢之地，帶珠江一水，近城郭而不囂，入山林而不僻。潮汐吞吐，峰巒照映，煙雲浮沒，勢高顯而行平整”。^③這個不囂不僻的郊遊勝地自此進入被嚴格限制的“外夷”視野。

海幢寺有接待旅粵遊散外商的經驗，在以防範外夷為主旋律的時代，接待“粵道貢國”使臣的重任自然也會落到海幢寺的身上。1793年12月馬戛爾尼使團經廣州返回英國，兩廣總督長麟在海幢寺為使團舉行“謝恩”儀式，並安排使團入住海幢寺隔壁的伍家花園，使團隨員巴羅（John Barrow）記載了“謝恩”儀式的情況：“我們從這裏前往河對岸，那裏有一座為此用杆和席搭蓋的臨時建築；其中有一副黃絲屏風，上面用金字繡上皇帝的名字。總督和官員們在這屏風前例行跪拜，表示感謝皇恩，因為他恩賜我們旅行順利。”^④使團副使斯當東（Sir George Staunton）也在記載入住伍家花園時提到海幢寺：“館舍位於一所大花園中，旁邊還有池塘和花壇。館舍的一側是座廟（即海幢寺），另一側是座高台。登台望遠，廣州全城景色及城外的江河舟楫俱在眼前。”^⑤

1794年荷蘭駐巴達維亞總督派遣正使德勝（Lsaac Titsingh）、副使范罷覽（Andre Everard van Braam Houckgeest）來華祝賀乾隆皇帝登基六十周年，8月15日荷蘭使團自巴達維亞起航經澳門到廣州。10月13日兩廣總督長麟又在海幢寺接見荷蘭使團，長麟告知德勝按例不在官署接待他們，去年接待馬戛爾尼使團也是安排在海幢寺。關於此次接待荷蘭使團情形，王文誥在其《長牧庵制府帶同荷蘭國貢使詣海幢寺接詔恭紀八首》中有詳細記載，其四：“龍象花宮湧海幢，杪樞貝樹蔭清江。慈客遙仰天威在，一日光榮遍海邦。”其五：“萬斛琉璃掛彩門，氍毹匝地映紅幡。今朝節府承明詔，樂奏鈞天語帶溫。”^⑥可見海幢寺當天排場的氣派。

1817年1月，從北京外交失利而來的英國阿美士德使團返抵廣州，1月7日兩廣總督蔣攸銛同樣也在海幢寺與阿美士德（Lord Amherst）會晤，據馬士（H. B. Morse）的《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記載，當天情況如下：“廣東總督由撫院和海關監督陪同，於中午前往現在作為不列顛

① 梁嘉彬：《廣東十三行考》，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01頁。

② [清]梁廷：《粵海關志》卷二十六，廣東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519頁。

③ 今釋：《募建海幢寺疏》，釋新成主編：《海幢寺春秋》，廣州：廣東省出版集團花城出版社，2008年，第32頁。

④ 《巴羅中國行紀》，[英]喬治·馬戛爾尼（George Macartney）、[英]約翰·巴羅（John Barrow）：《馬戛爾尼使團使華觀感》，何高濟、何毓寧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年，第469頁。

⑤ [英]喬治·斯當東（Sir George Staunton）：《英使謁見乾隆紀實》，錢麗譯，北京：中國工信出版集團電子工業出版社，2016年，第364頁。

⑥ 林劍綸、李仲偉：《海幢寺》，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79—80頁。

使團駐所的河南寺（海幢寺），事先已在通往主神殿的人行道兩旁建了幾個臨時房間，大神前面一個為此次儀式使用的小房間，主要是以黃色裝飾物裝飾。上述的三位中國官員到來，進入這個房間，並坐在一張黃色的桌子左方，即大位。桌子放置皇帝函件，並向特使報告他們的到來。”^①

由此看來，海幢寺介入“外夷”事務，多少有點被動色彩，在“一口通商”的大背景之下機緣巧合地參與到中外交往之中，成為當時中西匯通的見證者和參與者。隨着外商、使臣陸續來到海幢寺，海幢寺因為多次介入“外夷”事務而在西方世界聲名鵲起，也吸引着更多的西方人慕名而來，他們的身份也不止商人、外交官，還有他們的家屬、職員、傳教士、作家、畫家和普通遊客，這些人通過他們的書寫共同地向西方世界塑造了一個更加多元化的海幢寺的形象。

二、來華西方人對於海幢寺的書寫

明清時代的海幢寺依山傍水而建，其建築物按一般寺門定式沿一中軸線興建，自江邊作東南向延伸，依次建有海山門——頭門——天王殿——大殿——塔殿——觀音殿（藏經殿），大殿北面左右還建有韋馱殿和伽藍殿。中軸線東側興建有茶房、香積廚、叢現堂、祖堂、佛母堂、僧舍、齋堂、地藏樓、扶福堂、大悲樓，西側為經坊、客堂、房舍、雲水井、雲水樓、諸天閣、禽畜舍、放生池。寺後園為花圃、水塘，觀音殿西南後山為烏龍崗，東南面為鐘樓、大榕樹，連接萬松嶺、普同塔。^②清代遊覽海幢寺的西方遊客大多沿中軸線而行，依次參觀，這在他們的記載當中有明顯的體現。

（一）西方商人書寫的海幢寺

海幢寺當初開放給西方人遊覽就是為了照顧商館區的外商對於活動空間的需要，故來華貿易的外商比較早留下了對海幢寺的記載。1805—1806年俄國商船“希望號”和“涅瓦號”首航廣州，期間曾發生商船被粵海關扣押的事件，但這也並不影響到“涅瓦號”船長里相斯基（Ю. Ф. Лисянский）遊覽海幢寺的雅興。他記載到：“最大的廟宇坐落在珠江對岸，歐洲商館的對面。從外表看它頗似一座修道院，由幾幢供祭祀用的建築組成，其中三幢立在長長的院子中間。我在廟裏待了幾個小時，發現到處都很乾淨。供台上擺滿了神像，一些殿裏是中間三尊兩側十二尊，另一些殿裏則是中間只有一尊，兩側數尊。所有的神像都鍍金塗漆。中間的神像高約1.5俄丈（2.7米），是坐姿。他們前面永遠點着檀香末做的香燭，而每個來祭拜的人都會帶供品來。……參觀了整座廟宇後，我拐進他們的膳堂。當時正是吃飯時間，聽到鐘聲大家都聚到飯桌邊，每個人面前擺着一碗米飯和青菜，用筷子吃。我得知，每個加入到住廟人群體的人在加入之前就必須放棄與女人有任何來往並禁止食肉和魚，違反這一誓言必定遭致死刑。飯後嚮導領我們到了一個關着20頭豬的非常乾淨的地方。這是居民送給寺廟的，而我不知道何以會賜予它們這樣一種神秘的地位。其中一頭大約有30歲，它老得連走路都費勁了。”^③里相斯基遊覽海幢寺的時間很短暫，但

① [美]馬士（H. B. Morse）：《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1635—1834年）》第三卷，區宗華譯，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05頁。

② 曾昭璿、曾新、曾憲珊：《清初廣州海幢寺創建考》，釋新成主編：《海幢寺春秋》，廣州：廣東省出版集團花城出版社，2008年，第23—27頁。

③ [俄]尤·費·里相斯基（Ю. Ф. Лисянский）：《“涅瓦號”廣州見聞》，伍星宇編譯：《19世紀俄國人筆下的廣州》，鄭州：大象出版社，2011年，第63—64頁。

也記錄下海幢寺的大致方位、寺院的主要建築、佛像、齋堂進食和放生豬，想必這些場景給他留下了比較深刻的印象。

與俄國商人里相斯基短暫遊海幢不同，美國人亨特（William C. Hunter）是旗昌洋行的合夥人，自1825年之後於廣州生活了二十多年，儼然一位資深“廣州通”，對於海幢寺也更為熟悉。他曾記載：“到商館對岸河南的大廟一遊，總是很有意思的。這座廟宇是華南各省中最大最漂亮的寺廟之一。……如果用英語來講，這座廟的名字是‘海的帳幔’（sea screen）。它擁有一個內容充實的圖書館和一個印刷作坊。在那裏，教義被刻在木版上，木版不斷地印出來，用來贈閱或出售。一系列大而漂亮的殿堂或獨立的廟宇，都建造在石砌的平台上，殿前有寬闊的花崗岩石階，周圍是低矮的石頭護欄，由花崗岩的石柱分開，石柱支撐着上面的屋頂。建築物的各種色彩、掛在裏裏外外柱子上的金子條幅，構成一種歡快的美妙氣氛；特別對外國參觀者是這樣。僧人的住處與大殿分開，並排地列於東西兩側，長度與寺相等。住持的屋子也和別人一樣，樸素而舒適，有一間會客室，陳設着好的傢俱，另一間相鄰的屋子裏有一個供着佛像的神壇，佛像前有永遠點着的線香，還像通常一樣，有一盞長明燈。”在寺院景觀的描寫之外，亨特還曾近距離觀看過海幢寺的誦經儀式：“每到晚上，和尚們，約有200—500人，聚集在三間一排的大殿上誦經。誦完經後全體繞場行走，一邊唱着經識，點着香，打着鐘；最後在表示過去、現在、未來的三尊巨大描金佛像的中間那一尊前面行跪拜禮。”由於和海幢寺的住持很熟悉，亨特還曾多次品嚐過海幢寺的齋食：“我們跟這位‘首席僧人’混熟了，有幾次他請我們共進早餐或吃晚飯，吃他那無與倫比的食物齋菜和水果。餐桌上總是擺滿各種鮮花，而且總有人很好地侍候。我當時剛從麻六甲英華書院回來不久，很高興有機會和他交談，炫耀我的中國官話。”當然，與里相斯基一樣，亨特也對海幢寺的放生豬感興趣，“在花崗石通道右側的房屋當中，有一座房子裏養着這個寺廟的一大奇觀——大約十二頭極其肥大的豬。它們肥得幾乎都走不動了”，並特別解釋“餵養這些豬是為了說明佛教的教義，不要殺生，要愛惜動物的生命”。^①

（二）西方外交官書寫的海幢寺

海幢寺接待的首批外交官就是馬戛爾尼使團，使團成員返回歐洲後在其著述中曾提到海幢寺，但並未對海幢寺有更多的景觀細節描述。1817年1月阿美士德使團抵達廣州，朝廷安排入住海幢寺，因此，阿美士德使團成員有更多機會接觸到海幢寺。埃利斯（Henry Ellis）是阿美士德使團的副使，在出使過程中留有完整的私人日記，他曾記載到：“這是我見到的最大的廟宇之一，也是有着最好的神像和其他附屬品的廟宇之一。為了讓我們在裏面居住，必須要把大殿裏的巨大佛像轉移，我們聽說它們被送到了對岸的廟裏。不過宗教活動並沒有中斷，僧人們每天圍繞着沒有被徵用的另外一個大殿巡行。我們不能不承認，有些宗教儀式似乎並不缺少神聖和莊嚴。”當然，他也沒忘記記載在歐洲享有盛名的放生豬，“我一定不能忘了說說祭祀用的豬。它們個頭很大，也很老了，被圈養在廟附近一個鋪着石頭的豬欄裏，在積累多年的污穢和惡臭中打着滾兒。”^②阿裨爾（Clarke Abel）是阿美士德使團的首席醫官，他在其《中國旅行記》（*Narrative of A Journey in the Interior of China and of A Voyage to and from that Country in the Years 1816 and*

① [美]亨特（William C. Hunter）：《廣州番鬼錄 舊中國雜記》，馮樹鐵、沈正邦譯，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84—385頁。

② [英]亨利·埃利斯（Henry Ellis）：《阿美士德使團出使中國日誌》，劉天路、劉甜甜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年，第287—288頁。

1817) 中詳細記載了在海幢寺的見聞：“我們居住在其中的這處大型宗教設施，除了數不清的神像之外，其面積幾乎相當於一個城鎮。寺中附有客房以及另外供僧人居住的建築，……寺中有許多鍍金的佛像，分佈在一片寬闊的寺院裏。”在對寺院建築的描述之外，阿裨爾投入筆墨最多的是對海幢寺信眾求佛儀式和僧眾法事儀式的描寫，關於信眾求佛，他記述到：“常常看到可憐的信徒們——多為女子——抱怨他們得到的報應或乞求佛的恩典。這個時候，在佛像的前面點着一根蠟燭，一名長老在場監督儀式的進行。信徒們要奉獻大米，同時在紙上畫一些圖畫作為供品，這些看來都是必須的和約定俗成的表演。僧人接過這些東西，將大米放到供案上，將圖畫用蠟燭點着，然後放入地上的一個陶盆裏，讓它燃盡，這個陶盆是公用的容器，用來放所有這些供品燃燒後殘留的灰燼。乞求者現在要從僧人手中接過兩塊形狀像腎的木塊，她要讓木塊多次從她的手中落下，同時充滿激情地喊一聲，再抬頭看佛像。當她做完這些後，僧人要從香爐中取出一些香灰，與大米混在一起，再交給她作為祭品，這樣儀式就完成了。”關於僧眾法事儀式，他記述到：“每天白天和夜晚不同的時間，都要敲鐘召集僧眾，僧人們便聚集到這座殿中做法事。一次主要的法事大約從下午四點鐘開始。這個時候，眾多光頭僧人身穿垂至腳踝的長袈裟，有的是黃色，有的是茶褐色，紛紛從周圍的建築中走來。他們在袈裟的外面還披着一條披肩，披肩穿過左肩，在右臂下用一個象牙環繫着；有的僧人左胸上佩戴着一塊白銅，可能標誌着他的身份等級。走進殿中，這些僧人除了一位主持之外，都跪倒在佛像的周圍。主持僧通過擺在供案上的蠟燭點燃一根沉香，標誌法事開始；他手持沉香祈禱幾秒鐘後，舉着它走向殿門，把它插在門外的小柱子上。他回到供案前，拿起一個盛着米的小碗，對着碗祈禱，然後拿着小碗走到殿門，將碗放在燃燒的沉香前。接着，他以同樣的方式奉獻了一杯燒酒，把它擺在盛米小碗的旁邊，再跪在面前祈禱幾分鐘，將倒空的杯和碗擺到供案上，然後與僧眾跪倒一起。在主持僧獻祭時，所有僧眾在有節奏地吟誦經文，一名僧人每隔一會兒就會敲擊木魚，發出一聲清脆的響聲，詠經的眾僧人就會有節奏地停頓一下。僧眾們在連續跪了一段時間後，突然都站了起來，排成兩排，繞着大殿行走，同時誦經幾遍，然後便四散而去。”^①

除了接待外交使臣之外，海幢寺在其歷史上還曾接待一位“大人物”。1891年4月俄國皇儲尼古拉二世(Nicholas II)訪問廣州，受到兩廣總督李瀚章的隆重接待，抵達當天傍晚皇儲便急不可耐地前往海幢寺參觀，“晚餐前太子殿下化名乘小船去了城市南郊的河南島，參觀那裏的佛教寺廟Hai-chwang-sze(海幢寺)”。由於行色匆匆，皇儲一行主要沿着海幢寺的中軸線行走，依次參觀山門、天王殿、大雄寶殿、觀音殿、普同塔。皇儲此行有研究過中國佛教的俄國漢學家波科季洛夫(D. D. Pokotilov)陪同，故而更能瞭解海幢寺佛教景觀背後的涵義。關於海幢寺的“四大金剛”，皇儲一行瞭解到：“一尊(綠臉)的標誌物是劍，他抓着它似乎帶着無聲的威脅(這位威嚴的神是東方各國的保護神，按照法師們的說法，是治理兇惡的急旋風的)。第二尊(紅臉)的標誌物是一把琴，目的是征服自然現象。他本身是火元素的化身，被視為南方的統治者。控制西方的第三尊(白臉)的標誌物是帶珠子的小傘，如果這個強大的保護天神高興的話，就在預定時間賜雨，發怒就乾旱；或打開自己的奇妙的幔帳，保護人們免遭不幸。第四個黑色天王是神秘的夜半領域的統治者，左手握着一個古怪的動物(像蛇)，它可以讓信徒認為那是不可

^① [英] 克拉克·阿裨爾(Clarke Abel)：《中國旅行記(1816-1817年)》，劉海岩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214-216頁。

戰勝的龍。”關於大雄寶殿供奉的三尊佛和十六羅漢，皇儲一行也瞭解到：三尊佛代表着“現在、過去和未來”，而十六羅漢代表着“在廣袤的亞洲地區被信仰的人物身上洋溢着平和、喜悅和安詳”，因為“每個傳道者和法師都有自己極其典型的面相、自己的光輝傳說和傳統的尊稱。比如說，那迦犀那尊者，坐在懸崖邊，雙手合十禱告：他的頭很醜，大嘴、濃眉、長長的鬚髯，耳朵上掛着耳環……很多像他這樣的忠實信徒把‘光明的福音’從遙遠的興都庫什山外帶到中國腹地”。而對於皇儲一行在海幢寺沒看到任何一個僧侶，他們認為“與在中國享有非常優越地位的喇嘛不同，本地神職人員（和尚）在儀式和日常生活方面，與日本和安南的同教者比跟西藏人和蒙古人更接近，他們在自己的鄉民中起着不重要的作用。……地方當局很少對他們客氣，比如說，1816年阿美士德勳爵使團路過時，地方當局把河南廟撥給他和隨從，而主要神像被送到河對岸。19世紀50年代混亂時期一度把這裏變成中國兵士的宿營地”。可見，儘管俄儲海幢之行行色匆匆，卻是不折不扣的一次深度遊。^①

（三）西方傳教士書寫的海幢寺

海幢寺開始接待西方人的年代正值基督新教東傳的開端，在海幢寺的外來參觀者中就有一批肩負對華傳教重任的西方傳教士，強烈的宗教優越感和傳教使命感使得他們在參觀異教徒的活動場所時難免帶有成見。倫敦會傳教士馬禮遜（Morrison）是新教對華傳教的第一人，1807年9月來到廣州，便住在十三行商館區的美國商館，海幢寺與商館隔江相望，11月1日馬禮遜寫信給他的哥哥，提到了他到海幢寺的場景：“我住的商館對面有一個‘河南’島，島上有一座宏偉的廟宇，裏面有很多佛像，有的足有20英尺高，寺裏有140名和尚。和尚完全剃除頭髮，只在寺院居住，嚴守清規戒律，不吃葷腥。和尚不教導人們，但是在一些場合下舉行約定的儀式。有一天晚上，我看見60位和尚晚禱時向佛像禱告，他們給佛下跪行禮，反覆念‘阿彌陀佛’，然後上香等。”^② 1830年2月美部會傳教士裨治文（E. C. Bridgman）和雅裨理（David Abeel）來到廣州，抵達後沒幾天馬禮遜便帶他們去參觀了海幢寺，裨治文稱海幢寺是“廣州城內外眾多寺廟中最宏偉、最金碧輝煌的寺廟之一”。裨治文參觀海幢寺的遊記後來發表在《教士先驅報》（*Missionary Herald*）上，字裏行間流露出一種特殊的既好奇又反感、既喜愛又厭惡、既欽佩又輕蔑的複雜情感：“寺院佔地數畝，四面高牆環繞，目前寺裏有150多位僧人。寺廟建築由亭子、殿堂和廂房組成。最大是一間大殿叫大雄寶殿，供着三尊佛像——過去、現在和未來佛——三尊大佛依次排開，在他們的左右兩側有十八尊菩薩弟子的塑像，叫作十八羅漢。現在統治中國的韃靼家族依據他們對輪迴的看法，稱他們的皇帝就是十八羅漢轉世。……我們在一個廂房裏看到一個印刷室，裏面有大量木版活字。此外還有一間書店，出售佛道和道德類書籍。我們還參觀了一位僧人的住所，他們的僕役曾做過我們的嚮導。他立刻叫人備上茶和蜜餞，請我們喝茶、用點心。他和馬禮遜先生用流利的官話交談，不時請我們原諒他招待不周，我們感謝了他的熱情款待並付了小費，然後起身離去。”^③

鴉片戰爭後“五口”通商，朝廷逐步實施宗教寬容，更多傳教士得以進入內地傳教。施美夫

① [俄]埃·埃·烏赫托姆斯基（Ухтомский）：《俄儲中國行》，伍星宇編譯：《19世紀俄國人筆下的廣州》，鄭州：大象出版社，2011年，第213—219頁。

② [英]艾莉莎·馬禮遜（Eilza Morrison）編：《馬禮遜回憶錄》，鄭州：大象出版社，2008年，第96頁。

③ [美]雷孜智（Michael C. Lazich）：《千禧年的感召——美國第一位來華傳教士裨治文傳》，尹文涓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60頁。

(George Smith) 是英國聖公會傳教士，1844年9月抵達香港，曾任香港維多利亞教區主教。抵達香港後不久，施美夫便開始了遊歷“五口”通商城市的行程，10月3日施美夫抵達廣州，10月7日施美夫遊覽了海幢寺，後來在遊記中描述了海幢寺的場景：“進廟後，穿過一個長長的院子，院子盡頭擺着一只用整塊石頭雕成的具有象徵意義的大龜。又穿過一重門，迎面看到兩個高大的雕像，據說是神化了的英雄，守護着寺廟大門。穿過又一進院落，進入一個前殿，殿內有四座巨大的神像，……使人意識到已進入‘四大天王殿’，其中有三尊，酷似古希臘、羅馬神話中的伊思庫勒、阿波羅和瑪律斯。……一條寬敞的大道由此通往正殿。正殿非常宏偉，和尚們在三尊佛像前做晚課。這三尊佛像，加上眾多的其他神像和祭壇的襯托，給人以莊嚴肅穆之感。許多和尚雙手合十站立，口中念念有詞，面向菩薩誦經。一個當值的和尚在領誦，伸長着脖子，一氣不歇地朗聲誦讀經文，不時有鼓聲、鈴聲作和。……由此出來後，我們被匆匆領到我們的朋友方丈的住處。出於禮貌，我們仍尊稱他為方丈。他彬彬有禮地接待我們，即刻奉上茶來。飲茶前，他與我們一一碰杯。接待過後，他派了一個小和尚領我們參觀寺內各處。……寺內頗大，佔地七、八公頃，種一些水稻，還有作觀賞用的小樹林。中心廣場兩邊建有僧侶居住的公寓和形形色色的工作用房。我們被引領到豬圈——聖豬之家。一般認為，這些豬豐餐飽食，神聖不可侵犯，皆因佛門子弟不守戒律，啖食豬肉，禍及它們的同類，所以寺廟善待聖豬，聊以彌補。於是，僧侶們對這些聖豬禮遇有加，以此為邪惡的世俗贖罪。在我們看來，這些豬過於肥大，趕了許久也站不起來，這恐怕是中國人認為神聖之處吧。”後來，施美夫在廣州期間曾多次訪問海幢寺，並與住持建立良好關係。^①

格雷(John Henry Gray) 是英國外交大臣派駐廣州沙面的本堂牧師，後一度升任香港維多利亞教區副主教，1852年來廣州，從事傳教活動23年，曾出版《中國——法律史、禮儀和風俗》(*China, A History of The Laws, Manners, and Customs of The People*)、《阿拉伯和它的信仰》(*Arab and its Faith*)、《漫步在廣州城》(*Walks in the City of Canton*)、《在1875—1876—1877的環球旅行》(*A Journey Round The World in the Years 1875-1876-1877*)等著作。由於長期待在廣州，格雷通曉中國語言和文化，對海幢寺非常熟悉，曾借用海幢寺的房舍從事寫作，與海幢寺住持私交甚好。^② 在其1875年出版的《漫步在廣州城》一書中，格雷曾花40頁篇幅詳細說明海幢寺的來歷，以及山門、八大金剛、四大天王、大雄寶殿、十八羅漢、舍利殿、觀音殿、畏盧閣、齋牙豬(Pow-Nga-Chue)、雲水房、經坊、客堂、齋堂、禪堂、大廚房、地藏樓十王殿、幽冥鐘、花園、茶毘爐、塔院、普同塔、西歸堂等主要代表性寺院景觀，並對太平天國和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廣州海幢寺的遭遇進行介紹。^③ 1876年格雷回到英國，並與茱莉亞·科克斯(Julia Cox)結婚，婚後夫婦二人一起在1877年回到廣州，一住就是14個月，直到格雷夫人感到身體嚴重不適，被迫在1878年回到英國。在廣州期間，格雷夫人常給遠在英國的母親寫信描述她在廣州的見聞，這種遊記性質的信前後共有44封，後來收集到一起，以《在廣州的十四個月》

① [英]施美夫(George Smith)：《五口通商城市遊記》，溫時幸譯，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7年，第25—27頁。

② [英]格雷夫人(Mrs. John Henry Gray)：《在廣州的十四個月》，梅貝堅譯，香港：茉莉花出版社，2011年，第1頁。

③ John Henry Gray, *Walks in the City of Canton*, Victoria, Hongkong: De Souza & Co, 1875, pp. 34-75.

(*Fourteen Months in Canton*) 為名在1880年出版了。^① 在這14個月當中，格雷夫人於1877年4月15日和1878年5月4日的信中兩次談到了海幢寺，在前一封信中格雷夫人描述初次參觀海幢寺的情形，“我們乘船到河南參觀漂亮的海幢寺，這是廣州保存得最完好，最值得一看的寺廟……廟裏有很大的神龕，裏面供奉着三座碩大無比的大坐佛，用木頭雕刻而成，外面鍍金；大佛的兩邊有十六尊矮一點的偶像，代表着大佛的高徒。每尊偶像前面，都擺放着個香爐。吊燈掛在鐵鍊上，從天花板垂下。這些是四時照亮大佛的長明燈。大佛的前面有三個很大的祭壇，祭壇上有多姿多彩的木雕，木雕都鍍金。祭壇上擺放了很大的鏝盤，裏面放置了人造花，有些則點上香。在另一個大廳裏的神龕，則放置着一個佛祖舍利，舍利盒上安置着一個雕工精緻的大理石舍利塔。第三個神龕放置着大慈大悲觀世音的大型偶像。”格雷夫人此次參觀海幢寺的時候，正好是僧人晚上誦經時刻，故而格雷夫人在信中詳細描述了誦經儀式的場景，並認為“僧人們都遵從着最嚴格的儀式，表現出最大的敬意”。^② 在後一封信中，格雷夫婦受邀參加海幢寺新任住持的授職儀式，故而格雷夫人在信中主要描述了授職的盛況，以及在儀式結束後參加住持宴請，並借機參觀海幢經坊、火化塔、象牙豬的場景，認為海幢寺“有太多有趣的東西了，我很想再次到來造訪”。^③

(四) 西方畫家書寫的海幢寺

除了上述西方人以文字方式書寫的海幢寺之外，海幢寺還以繪畫形式享譽海外。在倫敦大英圖書館特藏中國清代外銷畫當中，就收藏有91幅清代廣州海幢寺的外銷組畫，這些畫將清代海幢寺內的總體佈局、建築結構，乃至一尊尊佛像都細緻記錄下來，甚至還生動記錄了當時海幢寺放生社內的豬圈。此外，還有描繪各種佛教建築、僧人生活、佛事活動、祭祀陳設等不同題材的畫作，成為當時西方人瞭解認識海幢寺的另一種重要途徑。^④ 外銷畫畢竟是在中國由中國畫師創作並出口到西方的畫作，當時還有西方畫家到海幢寺創作的案例。1838年8月到10月，法國畫家奧古斯特·博爾熱 (Auguste Borget) 在廣州作畫兩個月之久，他乘船自澳門抵廣州，租了一隻小艇，漫遊於珠江之中，把沿岸景色一一收入畫中。在廣州期間，博爾熱多次來到海幢寺，並作了一幅《海幢寺》石版畫，畫的左面畫出半個大殿，殿前是一株古榕，枝繁葉茂，樹下寺院中有不少遊人。在廣州期間，博爾熱創作的畫有：《廣州河南海幢寺》、《廣州一石橋》、《廣州近郊廟宇前的廣場》、《廣州商館》、《廣州河南海幢寺內景》、《廣州河道風光》、《廣州流動小吃攤》等等。^⑤ 他回國後還出版了《中國與中國人》(素描集) (*La Chine et les Chinois*)，法國作家巴爾扎克 (Honoré de Balzac) 曾評價稱：“假如作者不是在巴黎刊行此書，而是用英語寫成，並且在倫敦出版這本書，那麼，只要一個上午，它就會從賣這本書的書店中消失的。”^⑥ 在廣州

① [英]格雷夫人 (Mrs. John Henry Gray)：《在廣州的十四個月》，梅貝堅譯，香港：茉莉花出版社，2011年，第1頁。

② [英]格雷夫人 (Mrs. John Henry Gray)：《在廣州的十四個月》，梅貝堅譯，香港：茉莉花出版社，2011年，第27—29頁。

③ [英]格雷夫人 (Mrs. John Henry Gray)：《在廣州的十四個月》，梅貝堅譯，香港：茉莉花出版社，2011年，第218—224頁。

④ 達亮：《清代外銷畫中的廣州海幢寺》，《法音》(北京)2015年第7期，第51頁。

⑤ 達亮：《清代外銷畫中的廣州海幢寺》，《法音》(北京)2015年第7期，第52頁。

⑥ [法]奧古斯特·博爾熱 (Auguste Borget)：《奧古斯特·博爾熱的廣州散記》，錢林森、張群、劉陽譯，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0年，第115頁。

期間，除了作畫，博爾熱還寫了一些遊記，記錄下了在廣州的心情，10月1日博爾熱來到海幢寺，日記記載：“外面的嘈雜聲那麼大，而寺廟內部卻如此莊重安靜，都讓我以為自己走進了另一個世界。……我無法向你說清，我親愛的朋友，在這些美麗的樹蔭下，在如此的寂靜中，我是多麼舒適地呼吸着，在這裏，只有我的腳步聲打破了這片寧靜。似乎我把所有日常的煩惱、一切不良的情緒都擱置在了門口，我希望在一個永恆的冥想中度過一生。”海幢寺的寂靜給博爾熱留下了美好的印象，但隨着參觀的繼續，海幢寺內的佛像和一些場所對外來遊客的限制，也讓博爾熱感到了不適甚至是惱火，在參觀天王殿時博爾熱看到殿的“兩邊各有一座巨大的雕像，它們的手裏握着巨大的寶劍，眼裏充滿了血絲，嘴裏長滿了嚇人的牙齒”。在試圖進入觀音殿時，“這裏是備受女性喜愛的女神的住所。無論我怎麼請求，人們都不讓我進去，對此我非常惱火，因為我覺得女人們可能把她們的溫情性格都獻給寺廟，她們經常到這裏來為她們的孩子向諸神祈求”。^①

以上選擇西方商人、外交官、傳教士、畫家等代表性群體參觀海幢寺的觀感，基本能夠勾勒出華西方人對廣州海幢寺的歷史由來、地理方位、建築景觀、宗教儀式，乃至宗教思想的大致看法，通過他們的不斷書寫，整體上向西方世界構建了一個不斷完整的海幢寺印象，海幢寺也由此奠定了在清代中後期中西交往中的地位，成為認識廣州、瞭解中國的一扇窗口。但由於中西宗教文化的差異，使得他們難免帶有主觀宗教成見去看待海幢寺的宗教景觀、宗教儀式和宗教思想，這種宗教成見直接影響到他們對於中國宗教文化的認識，影響到了中西之間的深度交往與融合。

三、西方海幢寺印象中的宗教文化觀念

值得特別提出的是，參觀海幢寺的西方人，無論是商人、外交官、傳教士、畫家，還是普通遊客，無論他們來自英國、荷蘭、法國、美國，還是俄國，他們大多是有基督教、天主教、東正教等基督教信仰背景的，因此，他們在進入中國的佛教信仰場所時不可避免地帶着自身信仰成見去看待中國的宗教信仰，他們未必是來華傳教士，但卻在客觀上為開拓在華傳教事業打造輿論基礎。

（一）關於佛教景觀

西方人認為中國的佛教寺廟內部佈局十分劃一，衛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在《中國總論》（*The Middle Kingdom*）中曾描述過一座標準寺廟的佈局，走進寺廟會一眼望見四大天王的塑像，寺門對面的龕中是彌勒佛，還有戰神關帝的塑像，走到屏障的後面，大殿裏是釋迦牟尼的蓮花坐像，兩旁站着較小的阿難和摩訶迦葉，大殿兩側還有十八羅漢塑像，後殿供着觀世音，所有寺廟都有大小不一的房舍、齋堂、書房和回廊。^②海幢寺的佈局與衛三畏的描述雖有所不同，卻也大同小異，海幢寺作為清代中後期少有開放給西方人閒遊的寺院，久負盛名，且有臨近商館區的地利之便，還是吸引了大批西方人前往。他們對於海幢寺的清幽，建築的精美、神奇還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海幢寺的部分建築裝飾、佛像造型和禮佛氛圍也給一些人留下不佳的觀感。

① [法]奧古斯特·博爾熱（Auguste Borget）：《奧古斯特·博爾熱的廣州散記》，錢林森、張群、劉陽譯，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0年，第39—43頁。

② [美]衛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中國總論》，陳俱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746頁。

阿美士德使團曾評價稱“寺廟建築外表裝飾一派俗豔華麗，使人有一種墮落的感覺”；認為寺院的佛像“形態和姿勢凸顯出傲慢神態”，“高度和比例都大得讓人生畏，體態肥胖，誇張的中國人相貌，大量鍍金，紅綠顏色是佛像的主要特徵，佛像前的供案上整天香煙繚繞”。針對寺院裏出現的神秘小院子和美麗的鮮花，使團認為這是“崇拜偶像的僧侶利用想像產生的敬畏與愉悅來控制被蒙蔽的信徒們”。^①裨治文在參觀海幢寺時，也看到“佛像不計其數，有些形體巨大，面目醜陋”，並對在場的西方白人祭拜佛像行為耿耿於懷，“我們穿過寺廟的一座座大殿，每座大殿都供着佛像——我們看見一些白人在佛前跪拜——他們把本屬於上帝的榮耀給了這些泥雕木偶。……看到這樣的場景，真是讓人痛心。但是對於那些深陷其中者，則是更大的悲哀，他們就像羅馬人，將上帝的真理當作謊言，禮拜那些偶像勝於我們應當永遠稱頌的創世者”。^②博爾熱在參觀海幢寺時也看到了嚇人的神像，並認為“無法理解為甚麼在這個民族居住的地方會有這麼多的宗教建築，他們看起來除了拜祭祖先就沒有其他祭禮了，而除法律之外也就沒有其他道德規範了；他們把身上的重負都轉移到僧侶身上，要他們來請求上天，請下各位神仙。我無法抓住任何一個幫助我理解他們信仰的標誌。他們的神像基本上都很嚇人，而時間並沒有使他們的信仰變得更優雅”。^③施美夫在參觀時，看到四大天王塑像認為“十分兇猛怪異”，當他在大雄寶殿看到有和尚在焚香，燃燒金箔時，認為“整個場景喧嘩嘈雜，令人困惑，烏煙瘴氣”。^④

（二）關於佛教儀式

佛教的宗教儀式和天主教的儀式有很多相似之處，法國傳教士古伯察（Evariste Régis Huc）曾列舉：“十字架，僧帽，法衣，喇嘛出門或在廟外舉行某些儀式時穿的斗篷式長袍；禮拜時的雙重唱，唱讚美詩，祓除邪魔，五條鏈懸掛香爐，可以隨意開關；伸出右手放在信士頭上以示祝福；念珠，教士的獨身生活，精神上退隱，崇拜聖者；齋戒，列隊行進，連禱，聖水——所有這些，都是我們和佛教徒之間的相似點。”^⑤因此，當天主教徒和基督徒來到海幢寺，看到這些異教徒在宗教儀式上與他們存在眾多相似點時，就難免流露出一快之意了。阿美士德使團曾見到過海幢寺的宗教儀式，阿裨爾記載到：“我們在寺院的主殿，有機會目睹這些儀式進行的過程，由於它們與羅馬天主教的儀式很相似，大大惹惱了早期來華的傳教士們。他們至少可以證明普雷麥爾神父的激烈言辭沒有錯‘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地方的魔鬼如此成功地仿冒真正教堂中的神聖儀式’。”^⑥阿裨爾是名醫官，卻不幸言中早期來華傳教士對中國宗教儀式的強烈不滿，馬禮遜在參觀海幢寺時就曾指出：“這裏的人都是偶像崇拜者，如果我有時間給你講講他們的無數的崇拜儀式，你可能會覺得非常可笑，也會對此好奇；但只要嚴肅地思考，你就會替他們感到深深的惋

- ① [英]克拉克·阿裨爾（Clarke Abel）：《中國旅行記（1816—1817年）》，劉海岩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214—215頁。
- ② [美]雷孜智（Michael C. Lazich）：《千禧年的感召——美國第一位來華傳教士裨治文傳》，尹文涓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60頁。
- ③ [法]奧古斯特·博爾熱（Auguste Borget）：《奧古斯特·博爾熱的廣州散記》，錢林森、張群、劉陽譯，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0年，第40—42頁。
- ④ [英]施美夫（George Smith）：《五口通商城市遊記》，溫時幸譯，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7年，第26頁。
- ⑤ [美]衛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中國總論》，陳俱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744頁。
- ⑥ [英]克拉克·阿裨爾（Clarke Abel）：《中國旅行記（1816—1817年）》，劉海岩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215頁。

惜……這些中國人多麼需要耶穌的傳教士啊！”^①博爾熱雖不是傳教士，可當他看到“這座建築的四個面上都放着一些桌子，桌子上擺着各式各樣插滿假花的花瓶和幾個燭台，燭台上一直都有蠟燭和香在燃燒”的這些宗教儀式時，也表示“這些儀式的細節與我們的儀式細節如此相似，難道你不和我一樣對此感到吃驚嗎？人們在神面前燃燒這些蒼白的模擬陽光的東西，在其腳下燃着香，以此來紀念他在大地上大量傳播的事物，這是否是為了承認神所創造的事物的偉大呢”？^②

（三）關於佛教信仰

對中國佛教景觀和佛教儀式的負面觀感背後反映出來的是西方人對中國佛教信仰的質疑，這種質疑集中體現在他們對於中國寺僧佛教修養狀態、信眾的信仰程度和寺院過多涉入世俗活動的不滿。當“涅瓦號”船長里相斯基進入海幢寺時，他的隨行中國嚮導頭上戴着帽子便進入神聖的廟宇，他認為“看起來景仰之情相當有限”，當他的隨行人員告訴他給佛帶來供品就會獲得貿易的利潤，向佛祭拜便可以順利航行回國等“好的回報”時，他當然會發現這種宗教信仰背後充滿了功利性動機。^③當阿美士德使團入住海幢寺，埃利斯卻發現“僧人們的臉上看不到虔誠的專注精神”，“帶有一種難以捉摸的虛無表情，就像是沉浸在印度神學所諄諄教誨的神聖存在之中”；當他們得知海幢寺被挪作他用，還把許多佛像遷走，並將房舍改動時，認為這是“中國人缺乏宗教莊重感的又一次表現，同時也並非是最微不足道的一次表現”；當使團在廟裏居住的時候，沒有看到過僧人以外的任何人參加宗教活動，他們便認為“中國人對待宗教確實不那麼熱衷，而是像我們一樣地有些默然”。^④裨治文在陪同馬禮遜參觀海幢寺時，曾與住持交談，認為“他顯得既不關心今生，也不關心來世”，“覺得他是一個可憐而又可悲的迷信者”。^⑤博爾熱在參觀時正好看到一位中國官員在祭拜，他寫道：“在祭台前，有一位官員跪在一小塊紅色的地毯上，他頭頂上遮着一把紅色的絲質陽傘，這個工具在這個地方其實沒有一點用處；在他的兩邊，在一個雙簧管、一個小鐘和一面鑼的伴奏下，有幾個和尚在唱經。這位官員時不時地把雙手舉過戴着帽子的頭頂，並以前額碰地。他向三位大神敬上香，獻上肉和水果等祭品。”在描述完這一祭拜過程後得出的結論是“儘管中國人總在讚揚他們古老的文明，他們卻仍處於信仰的初級階段”。^⑥當俄國皇儲一行進入海幢寺，他們發現在寺院山門口大殿一側竟然有一些富裕的民眾為年老的家人準備的空棺，在觀音殿他們發現在一塊布上有用絲線繡着的富豪浩官家族的女人的名字，當他們進入寺內竟然沒看到任何一個僧侶，便認為“他們在自己的鄉民中起着不重要的作用”，“地方當局很少對他們客氣”，^⑦地方當局可以把海幢寺變成使團住所，可以變成士兵的

① [英]艾莉莎·馬禮遜 (Eilza Morrison) 編：《馬禮遜回憶錄》，鄭州：大象出版社，2008年，第96頁。

② [法]奧古斯特·博爾熱 (Auguste Borget)：《奧古斯特·博爾熱的廣州散記》，錢林森、張群、劉陽譯，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0年，第41頁。

③ [俄]尤·費·里相斯基 (Ю. Ф. Лисянский)：《“涅瓦號”廣州見聞》，伍星宇編譯：《19世紀俄國人筆下的廣州》，鄭州：大象出版社，2011年，第63頁。

④ [英]亨利·埃利斯 (Henry Ellis)：《阿美士德使團出使中國日誌》，劉天路、劉甜甜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年，第288頁。

⑤ [美]雷孜智 (Michael C. Lazich)：《千禧年的感召——美國第一位來華傳教士裨治文傳》，尹文涓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60頁。

⑥ [法]奧古斯特·博爾熱 (Auguste Borget)：《奧古斯特·博爾熱的廣州散記》，錢林森、張群、劉陽譯，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0年，第40頁。

⑦ [俄]埃·埃·烏赫托姆斯基 (Ухтомский)：《俄儲中國行》，伍星宇編譯：《19世紀俄國人筆下的廣州》，鄭州：大象出版社，2011年，第213—219頁。

宿營地，這些都是海幢寺涉入世俗事務的表現，也反映出朝廷和當地鄉民對海幢寺的不尊重。

與中國的宗教信仰如此不堪相比，西方人卻認為海幢寺的寺僧對基督宗教非常熱衷。施美夫描寫到：“每次進寺，都有許多地位較低的和尚圍上來，打着各種手勢索要煙草。我們明確告訴他們，沒有那種禮物，而贈送他們幾本《以弗所書》，以及一本名為《永恆的賜福之道》的小冊子，很受歡迎。……離寺時，我們看到有幾個僧侶坐着讀我們贈送的書。在以後的訪問中，更多的僧侶向我們索討。有一次，方丈本人要求從我們屋中借閱一本米憐博士撰寫的佈道手冊。下次去方丈住處時，他給了我一本盛在香木匣子裏的精緻的小冊子，裏面用漢語記載着拜佛經文。佛經原本用的是古印度巴利文，用漢字拼寫，讀起來毫無意義。”^①傳教士對耶佛的截然不同態度，顯然有他的傳教需要，通過貶低中國的宗教信仰，來實現傳播西方基督教的目的，這是他們的宗教優越感和使命感使然，更是他們的傳教策略。

（四）關於佛教思想

在描述完佛教景觀、佛教儀式、佛教信仰之後，西方人還試圖從中尋找這些宗教現象背後所體現出來的佛教思想。衛三畏認為：“佛教在中國的勢力，主要在於有能力提供民眾所缺少的關於未來狀態的觀念和能治理眾人和天地萬物的神。”^②為了便於民眾去理解這個抽象的“未來狀態”和“神”，佛教寺院在景觀佈置、神像設計與宗教儀式上採取了很多具體的現實表達，因而參觀海幢寺的俄國學者烏赫托姆斯基（Ухтомский）才會提出“佛教在東亞很多地區戰勝了敵對的多神信仰，多多少少是因為它除了極樂永生的抽象思想外，還引入了阿彌陀佛神奇世界的鮮明形象。東方民族的感性想像需要營養，需要具體的概念而不能忍受抽象。外來的印度信仰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相對誇張的宗教儀式以及與罕見偶像的‘經’書一起引入中國（儘管很遙遠）的還有外國畫家的作品”。^③除了解釋這些佛教景觀和儀式之外，他們還希望找到佛教信仰與世俗的關係，烏赫托姆斯基認為“釋迦牟尼的宗教提倡君主崇拜，尊重人民統治者和佈施王侯自古以來就是信奉它的僧侶們的義務”。^④甚至在有些統治者那裏，他還是佛的化身。因此，中國的封建統治者們大多禮佛，對佛教學說和僧侶階層“放任自流”，允許其發揚光大，正因如此，海幢寺才會一次次進入朝廷官員的視野中發揮特殊作用。

但中國畢竟是以儒立國，除了“儒教被國家、聖人、學者奉為唯一正教”之外，^⑤對於其他宗教往往都如佛教一樣“放任自流”，這就造成中國宗教極為多元，僅明清時代的廣州便有寺廟道觀百餘座，其中最多的就是佛教寺廟，其他還有民間信仰和祖先崇拜，傳教士認為這些不同的信仰“分屬不同的邪端異教系統，控制着百姓大眾的思維”。傳教士反對盲目崇拜，但中國人卻廣泛地參與到各種宗教活動之中，對於傳教士而言這是不可饒恕的罪孽，帶着這種眼光去看中

① [英]施美夫（George Smith）：《五口通商城市遊記》，溫時幸譯，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7年，第27—28頁。

② [美]衛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中國總論》，陳俱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737頁。

③ [俄]埃·埃·烏赫托姆斯基（Ухтомский）：《俄儲中國行》，伍星宇編譯：《19世紀俄國人筆下的廣州》，鄭州：大象出版社，2011年，第216頁。

④ [俄]埃·埃·烏赫托姆斯基（Ухтомский）：《俄儲中國行》，伍星宇編譯：《19世紀俄國人筆下的廣州》，鄭州：大象出版社，2011年，第215頁。

⑤ [英]施美夫（George Smith）：《五口通商城市遊記》，溫時幸譯，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7年，第29頁。

國的宗教信仰，他們當然會看到各種問題。而從另一方面言之，宗教多元化存在意味着人有宗教信仰的迫切需求，這對於開拓在華傳教事業來說未必是壞事，所以施美夫說：“這也表明，無論世界何處，人類生存不能沒有宗教崇拜；人若沒有獲得真正的宗教，則不可避免地會尋求異端邪教。”^① 傳教士借中國宗教信仰狀況表達傳播基督教之意不言自明。

結語

綜上所述，為弘揚佛法而創建的廣州海幢寺，在清代中後期恰逢“一口通商”與開啟在華傳教的雙重背景下，機緣巧合的參與到了中西交往之中，成為中西方文化交流乃至政治外交往來互動的重要管道。海幢寺因接待商人、使臣而在西方世界聲名鵲起，吸引着各種不同身份的西方人來到海幢寺，並通過他們的書寫向西方世界塑造了一個日益多元複雜的海幢寺形象，也推動了西方世界對於中國宗教文化與廣州風土人情的瞭解。但出於對工業革命以來西方文明的優越感和自身宗教身份的高度認同感，他們在書寫海幢寺的過程中，不可避免的流露出對海幢寺宗教景觀、宗教儀式、宗教信仰乃至宗教思想的不滿，也由此造成了他們對於中國宗教文化不可消解的成見，這些宗教成見的存在直接影響到了中西之間的深度交往。對於旨在開拓在華傳教事業的新教傳教士來說，將中國宗教文化有意無意地塑造成信仰低級、封建迷信、異端邪教等負面形象，同時展現中國佛教徒對西方基督教經書的渴望，無疑是向西方世界展現出在中國傳教事業的無限可能性，因此，海幢寺作為佛門寺院為“一口通商”提供防範“外夷”場地不假，卻也為開拓在華傳教營造輿論基礎。處在如此社會大變局之中，佛門清淨之地也無法獨善其身，這未必是當時佛門寺僧願意看到的局面。

[責任編輯 陳超敏]

^① [英]施美夫（George Smith）：《五口通商城市遊記》，溫時幸譯，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7年，第28頁。